

中國改革開放與新自由主義 全球化

盧荻

中國改革開放至今四十年，對這個歷程的分析、評價各式各樣，大都蘊含着對未來走向的判斷或期待。因此，這其中就不乏各種純粹執著於立場信仰的評論，在學術上則表現為單純以理論建構的理想化模式來對照、評價現實，這種做法在知識上和實踐上都很有導向偏頗的風險。本文試圖另闢蹊徑，透過歷史視角考察改革開放，以其實際歷程中的「典型化事實」為基礎，建構與之相一致的解說。具體而言，本文首先將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置於國際比較視野，以凸顯中國表現的特殊性；進而將這些特殊性聯繫到在此期間世界範圍內的制度變革及其發展後果，即所謂「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趨勢，由此對中國改革開放歷程作出一些雖是初步但有現實基礎的判斷、評價。

一 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的國際比較

任何對改革開放歷程的評價，都必須以它實際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為基礎，這應該是無可置疑的。就經濟增長表現看，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為最全面的量度指標，中國在1978至2017年間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達9.51%，相對於1952至1978年間的6.15%明顯加速增長。以人均GDP年平均實際增長率計算，在這兩段期間分別錄得8.56%和4.14%，前者更是後者的兩倍有多^①。

誠然，GDP增長只是反映了經濟總量的擴張，至多是社會發展所需的物質條件的提升，而非社會發展本身。改革開放的批評者或質疑者一般指出，在此期間其實存在着多種背離社會發展的情況，諸如收入分化、環境破壞、勞動條件惡化，以至政治和社會壓力持續等等^②。姑勿論這些情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屬實，其影響始終會被整體性的社會發展指標包括進去。

種種社會發展指標中最具整體性評估意義的應該是人均預期壽命，從1978年的65.86歲提高至2016年的76.25歲，近四十年間提高了10歲，比1966至1978年間的提高14歲，這好像並不怎麼突出，至少遠遜於經濟增長表現的

差距。不過，人均預期壽命的提高自有其規律，在既有醫療技術的限制下，當超過了特定的年齡臨界點，就會出現提高速度放緩的現象。一個較為合理的量度方法是將中國的表現放在世界範圍作比較：1966年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比全球中等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數低1歲，至1978年已經比後者高6歲，至2016年則比後者高5歲，雖則中國直至上世紀末才從低收入經濟體邁進中等收入經濟體行列。

總括而言，改革開放年代的社會發展表現，就縱向歷史比較還是值得表揚的，就橫向世界範圍比較也相當出色。中國在1966至1978年間的發展表現主要是依靠其政治和社會體制（尤其是人民公社體制提供的普及化農村醫療系統），在改革開放年代的表現則應該是有賴於物質條件的提升：在1978至2017年間，全球中等收入經濟體的人均GDP年平均實際增長率僅達2.70%（加上低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數則是2.57%），而中國的增長率是它的三倍有多。

一旦承認改革開放年代經濟增長的優異表現是構成社會發展的基礎，那麼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這個表現的成因或動力是甚麼？「改革開放就是答案」——這是最常見的來自官方的說法；更普遍的說法是，符合全球化年代世界範圍有關後進國家的主導意識形態，即所謂「華盛頓共識」。由於官方的說法較為籠統，因而以「華盛頓共識」來解釋中國經驗確實很有成為主流的大勢，尤其可以將經濟增長簡單地訴諸於經濟市場化、融入世界市場，以及私有部門的擴展等等，總之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策信條。

然而這種解釋很有將市場「物化」，也即神學化、迷信化的味道；以非歷史的理論模式來觀照、解讀歷史，面對現實時總顯得左支右絀，放之四海而皆不準。首先是全球化年代世界範圍普遍推行市場化改革，卻並沒有取得國際決策機構對各國以及各國政治建制對人民所承諾的發展業績；正如上述，在1978至2017年間，全球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經濟體的人均GDP年平均實際增長率僅達2.57%，如果從中撇除人口佔比近四分之一的中國，餘下的發展中國家的表現就更令人失望了。再看中國本身，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公有制（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部門佔絕對主導，之後公有制部門確實大為萎縮，但至今仍然控制着戰略性產業，而整體經濟的發展道路是以快速資本深化、而非勞動密集為主導，都是根本偏離了市場原則。

因此，我們必須破除物化式認識障礙，必須有遠比「華盛頓共識」全面和細緻的認識框架，方能有效解釋中國過去的經濟表現，從而恰當地評價改革開放的建樹和不足。而無論是哪個框架，首先都必須有一個認識：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始終是資本積累，經濟體制的作用在於有效率地動員社會資源並配置到生產性部門中。在1980至2016年間，中國經濟的投資率（即資本形成佔GDP的比重）平均達到40%的水平，比之前十年的平均34%提高了6個百分點；而中國之外的發展中國家則從之前十年的平均27%下降至1980至2016年的24%，同期發達國家則從27%下降至23%。顯然，正是投資率的差異，促成了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年代快速增長，以及其表現遠超世界範圍內的後進國家。

中國的改革開放年代，也正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年代，自1970年代末期開始持續至今。下文的論述將闡明，新自由主義的表現是經濟金融化，也即金融投機活動愈趨佔據主導，排擠生產性投資，導致世界範圍的投資率在全球化年代不升反降。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其後果都呈現為去工業化趨勢，只是前者作為金融化的發源地和集中地，去工業化趨勢遠為迅猛，包括大量製造業的快速向外轉移。

在此期間，中國幾乎是全球唯一快速推進工業化的經濟體。截至2016年，中國穩據全球第一工業國的位置，工業增加值、製造業增加值分別佔全球的22%和26%，其中製造業增加值超過了美國、日本兩國的總和。而製造業的特徵，一方面是本身具有規模和範圍效益的潛質，另一方面是能夠推動整體經濟的技術進步。由此，不同於發達國家的產業空心化、以大量從事非生產性活動的服務業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在改革開放年代卻成為全球最大的生產性經濟體，而同期的快速經濟增長正是與此相聯繫。

全球範圍的產業布局調整，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都應該會帶來相同的機遇，但為甚麼只有中國得以如此快速推進工業化？顯然，在全球化之外，還有中國特有的因素在起作用。上文強調的高投資率是其一，改革開放之前已建立起來的工業基礎是其二，中國經濟自身需求規模的擴張是其三，這三者都有賴於內部的制度和結構條件的支撐。因而，解析、闡明這些支撐條件的形成和運作，也就成為評價改革開放的關鍵。

二 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信條與系統邏輯

「新自由主義」一詞，作為對全球化年代資本主義性質的概括，發端於拉丁美洲；大約自新世紀以來開始在英語世界流行，到2007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在發達國家爆發並演化成世界範圍的經濟衰退後，這個詞彙就成了公共輿論的慣常用語。

據英國經濟學者薩德－費洛 (Alfredo Saad-Filho) 分析，在學術文獻以至公共輿論中，「新自由主義」一詞可以從四個層面上理解：一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經濟學理論，以奧地利－芝加哥學派為代表；二是經濟政策，構成了聲名顯赫的「華盛頓共識」；三是壟斷資本的階級鬥爭戰略，代表者是美國里根 (Ronald W. Regan) 政府和英國撒切爾 (Margaret Thatcher) 政府等右翼建制的作為；四是當代資本主義的系統性運作邏輯，表現為普遍的資本投機化和勞動非正式化、臨時工化^③。這其中最清晰可辨的是經濟政策。所謂「華盛頓共識」，指的是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世界銀行等「華盛頓建制」及其遍布世界的附庸的三代政策信條：自1980年代初開始推行的市場和外貿自由化、自1980年代末開始推行的公共資產資源私有化，以及自1990年代初開始推行的金融（尤其是對外金融）自由化。

這些信條的核心是市場原教旨主義，不僅其經濟學基礎如是，就連IMF的官方文件也以此自居和自豪。將這個立場表述得最為直白的是2000年秋季IMF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該報告是作為對此前二十年的全球化進程的總結^④，而這二十年卻正是世界範圍「發展失落，儘管普遍推行市場化改革」(這是世界銀行當時一篇論文的主題)的時期，其中以蘇聯集團國家的「休克肅條」最為慘烈，以原先有着「發展奇跡」的東亞於1997至1998年陷入金融和經濟危機最為矚目^⑤。

IMF對東亞金融和經濟危機的解釋一如既往依據市場原教旨主義，斷言危機純粹是經濟體內部制度違反市場原則所致，即所謂「裙帶資本主義」(又稱「權貴資本主義」)。這個解釋及其相應政策要求，甚至一度導致華盛頓建制出現內部爭論、分裂，時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嚴厲批評IMF無視經濟危機主要源自世界市場的金融投機化。同樣的批評還來自活躍於國際輿論界的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而他卻是之前主導蘇聯集團國家「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改革的顧問。只是這些批評者始終無法撼動新自由主義信條和建制，當時薩克斯早已被邊緣化，而斯蒂格利茨也在建制運作下被提前解除了在世界銀行的職位。

上述IMF以至整個華盛頓建制以市場原教旨主義自詡，並非單純是認識或信仰使然，更根本是有現實利益的勾連，自是不會容忍任何異端的挑戰。事實上，大約自東亞金融和經濟危機開始，有一個說法就深受建制批評者認同，即所謂「華爾街—美國財政部—IMF」這個綜合體主宰了全球的政治經濟秩序^⑥。這個說法意味着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年代的世界資本主義存在着深層的邏輯一致性。

歸根究底，「華盛頓共識」的三代政策信條，是要使得所有的資產資源都可作為金融交易，以便利資本流動，追求最高水平的利潤回報，這就是要系統推動經濟金融化。所以，自1990年代初期至今，金融化已經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系統性運作邏輯，而金融霸權則佔據了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核心位置。

金融化，也即資本日益轉向投機活動，勢必擠壓生產性的長期投資。這種擠壓效應同時會加劇收入分配差距，壓抑消費增長。結果就是，當代資本主義具有走向系統性需求不足的內在傾向，從而引發經濟危機。與此同時，投機活動聚焦於分配利潤，而不是創造利潤，因而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總是首先在金融領域以金融不穩定、甚至金融崩潰的方式爆發。簡而言之，金融化的邏輯導致它自身的不可持續。

然而弔詭的是，在現實中，直到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前，金融化確實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用以解釋這一悖論的是「掠奪性積累」，也即通過覆蓋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來壓低生產性資源的成本，抵消生產性投資不足對資本積累的負面作用。全球化時代資本積累的主要基礎，是將原來不屬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生產性資源納入其中，包括金融掠奪，以及將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吸納進來；後一種積累途徑表現為世界市場上勞動力供給的擴張速度高

於勞動力需求的擴張速度，構成了所謂「逐底競爭」（即發展中國家競相削減勞動者權益以維持產業競爭力）的趨勢^⑦。

「掠奪性積累」這個概念，是由當代最負盛名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哈維 (David Harvey) 所提出的，他的論述傾向於強調金融掠奪活動，淡化勞動力吸納的重要性；這個傾向既有理論上也有實證上的緣由。從理論上講，在金融化背景下，資本總體上傾向於通過投機而不是生產來獲得利潤。但凡有一點可能，特定地域的資本都要從當地的投入—產出構造中抽身。但是，資本主義的整體運轉不可能脫離生產，於是從事生產的資本唯有盡量避免大規模地沉澱投資，同時最大限度地用勞動代替資本。從現實上來看，正如批評金融化的論者所指出的，當今世界的政治經濟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由「華爾街—美國財政部—IMF」這個綜合體所主導。在全球化導致的一系列發展危機中，都能見到金融投機下的掠奪活動，最顯著的事例是蘇聯集團解體後的市場轉型與東亞金融和經濟危機^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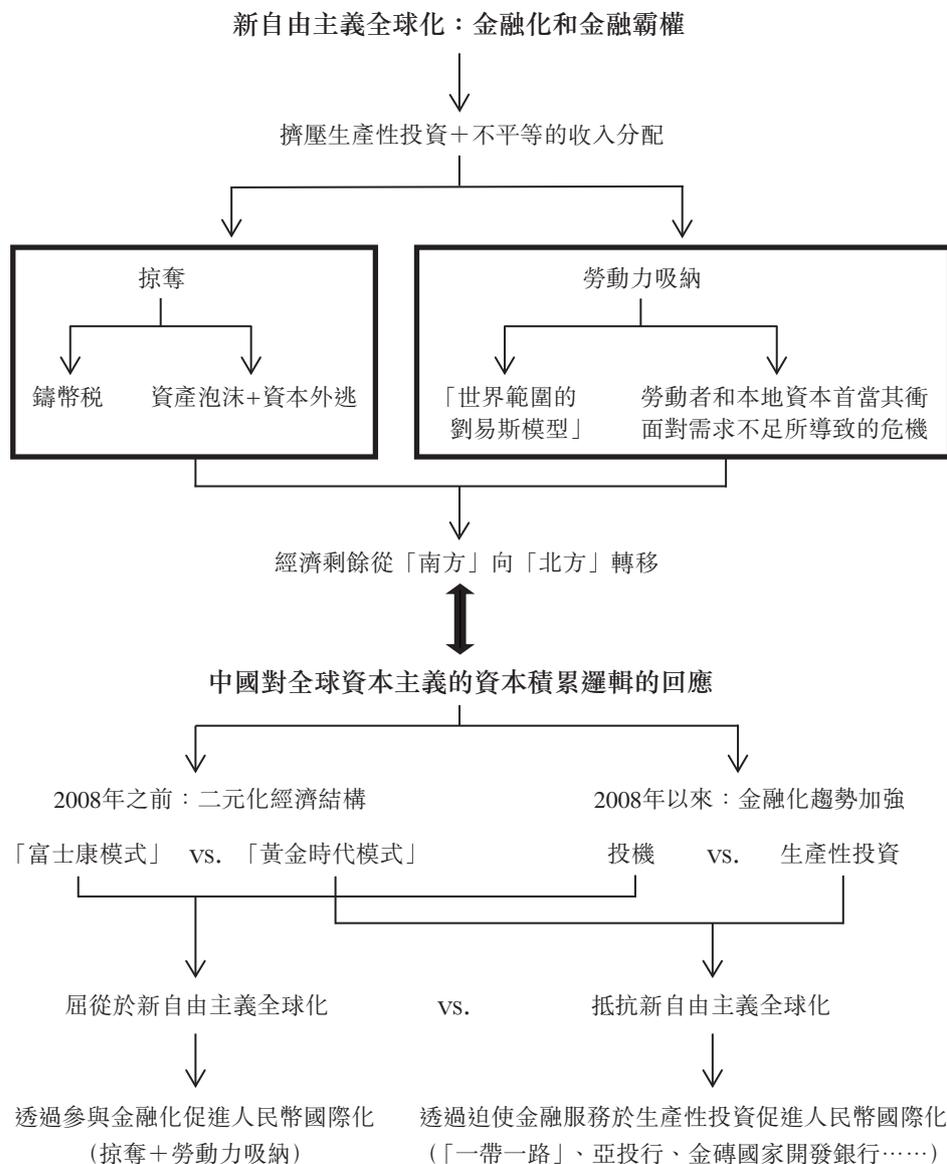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勞動力吸納對於掠奪性積累同樣極其重要。一方面，從全球化時代勞動力吸納的規模之大，就能反映出其在系統意義上的重要性。據IMF估計，在1980至2005年間，為世界市場生產的勞動者人數大致上翻了兩番，新增的勞動力絕大多數來自發展中國家。毫不誇張地說，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形成全球性的勞動力市場。另一方面，如此快速的勞動力增長導致了「世界範圍的劉易斯模型」（「現代—傳統」二元化結構中「現代部門」的勞動力無限量供給）格局：來自發展中經濟體無限量供應的勞動力，等待來自發達經濟體的資本的僱傭。

在這種情形下，全球發展勢必在擴張時期問題重重，在危機期間則受到毀滅性打擊。在勞動力吸納的擴張時期，勞資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意味着經濟剩餘從「南方」(the Global South, 指作為整體的全球發展中國家) 流向「北方」(the Global North, 指作為整體的全球發達國家)，發展中經濟體被困於低技術、低工資的陷阱。在危機期間，相關的發展中經濟體則首當其衝地受到需求不足的打擊，特別是因為低工資，使得這些國家無法形成內部的大眾消費市場作為抵消外部衝擊的緩衝。金融掠奪由是登場，陷入危機的發展中經濟體更受劫難。

總括而言，圖1上半部分的邏輯鏈描繪了全球化年代資本主義的系統性積累邏輯。發端於「北方」的金融化擠壓了生產性投資，導致需求不足，於是持續的金融化就愈來愈依賴於掠奪性積累，也即攫取「南方」的經濟剩餘。這個過程由掠奪性的金融活動和勞動力吸納共同構成。掠奪過程既可以是平和的，也即發展中經濟體向發達經濟體交納鑄幣稅（被迫持有巨額外匯儲備）；也可以是暴力的，即危機期間國際金融機構對發展中經濟體的生產性資源的全方位快速劫掠。勞動力吸納大多發生在經濟擴張期間，通過創造「世界範圍的劉易斯模型」，經濟剩餘從勞動力流向資本，因而從「南方」流向「北方」就成為系統性的過程。

在這個流動過程中，個別發展中經濟體或許能從這種勞動力吸納過程中獲益，前提是它們必須能夠留存部分（哪怕是比例遠低於被「北方」抽走的）經

圖 1 中國與新自由主義年代的全球資本主義示意圖



濟剩餘，並且能夠有效率地將這些剩餘配置到生產性部門中，使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從而抵消經濟剩餘外流的損失。然而，在生產性投資擠壓效應盛行和「逐底競爭」的背景之下，這種獲益的經濟體只能是特例，不可能是常態——而中國正正就是一個特例。

三 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模式的演化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究竟是一個剝奪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體，還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是一個遭受剝奪的經濟體呢？自新世紀

以來中國經濟活動的「走出去」，究竟是增強還是削弱了上述全球資本主義的系統性積累邏輯呢？回答這兩個問題對於我們理解中國和世界發展來說至關重要。

先從勞動力吸納的角度分析，一般認為，從改革開放伊始至今，中國走的是一條勞動密集、出口導向的工業化道路；將中國的勞動力納入世界市場，在塑造「世界範圍的劉易斯模型」方面扮演了關鍵角色。前面提到，根據IMF估計，在1980至2005年間，為世界市場生產的勞動者人數翻了兩番。這個估計是在按照各國出口對GDP的比重調整了勞動力數據後，將各國的數據加總而得。本文在此使用一個更加直觀的數據描述：在2005年，為世界市場生產的勞動者人數是1980年的2.28倍，來自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人數是1980年的3.79倍，來自中國的人數是1980年的8.65倍。換一個角度看，在1980至2005年間，為世界市場生產的新增勞動者中有一半來自中國。中國工人佔世界工人總數的比重從1980年的8%增加到2005年的32%（儘管近年來該比例有所下降，到2013年降為19%）^⑩。

伴隨着勞動力吸納的是上文所述的掠奪性積累對後進國家的負面影響。中國經濟中的「富士康模式」飽受詬病，作為跨國資本控制下的血汗工廠的典型代表，經常被用來表明中國經濟的「世界工廠」特徵。「富士康模式」代表了所有的發展缺陷，包括微觀層面的低資本—勞動比率、高勞動強度、極度異化的生產組織和勞動環境、低工資，以及宏觀層面的消費不足問題。遵循這種模式的結果是經濟擴張時剩餘流出，經濟危機時產能過剩。

然而，「富士康模式」真的能代表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嗎？或許，它至多只能代表加工貿易部門——進口零部件組裝為最終產品後再向世界市場出口。從1990年代中期到現在，加工貿易項下的出口額一直佔中國商品出口總額的一半左右，以淨出口與總出口的比率粗略地作為加工貿易的國內附加值率，這個比率從1990年代中期的20%逐步增加至2009年45%的高峰，而以此計算2009年加工貿易項下的國內附加值，也只是僅佔當年中國GDP的5%左右。換言之，中國經濟其實存在着某種二元化結構，加工貿易只不過是一個「飛地部門」，在整體經濟中所佔分量很有限。

筆者認為，中國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經濟發展的主流，其實並不是勞動密集、出口導向的工業化。尤其是自世紀之交以來，總出口中機械與運輸設備佔比不斷提高；即便在人民幣持續升值的情況下，中國仍然保持巨額的貿易順差、實際工資持續上升、勞動生產率快速提升等等，這些都意味着廉價勞動力不是支撐中國出口和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持續快速的生產性投資增長，以及在世界經濟日益金融化的背景下保持相對的非金融化，是遠為重要的因素。

實際上，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經濟就呈現出走向「黃金時代模式」的趨勢——也即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在1950至1973年間的經濟模式，表現為消費和投資、工資和生產率、就業和產出近乎同步的持續快速增長。正是在這樣的模式作用下，中國才能維持收入增長，從發展中經濟體大量吸收大宗

初級產品。而這樣的進口規模，加上「富士康模式」傾向於壓低出口價格，也就解釋了中國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為甚麼會愈趨惡化，為後者提供了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年代極為難得的資本積累來源^⑩。

再來分析一下金融掠奪問題，最明顯可見的是鑄幣稅，表現為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持續流向發達國家。這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自1990年代後期以來發展中國家持有的外匯金融資產大量增加。單就官方外匯儲備而言，若以能夠滿足多少個月的進口支付來衡量，全球發展中國家的官方外匯儲備規模從1995年底的4個月增加至2014年底的11個月，中國的儲備規模則從7個月暴增至21個月；相形之下，全球發達國家的外匯儲備一直維持在2至3個月的較低水平^⑪。

這種資本大規模地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情況，與新自由主義信條的承諾完全相反——後者承諾資本將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以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顯然，發展中國家普遍吸取了東亞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教訓：面對全球經濟的日益金融化，一國需要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來抵禦金融投機、維持貨幣穩定。但是這樣做不是沒有代價的，在儲備回報率長期走低的情況下，積累外匯儲備實質上就是向儲備貨幣發行國交納鑄幣稅，這構成了經濟剩餘從廣大發展中國家流向金融霸權國家的重要途徑。

中國的情況最為極端，除了世界市場金融投機壓力之外，還得面對經濟學家麥金農 (Ronald McKinnon) 和施納布林 (Gunther Schnabl) 所提的「貨幣錯配」難題。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體，中國有着最大額的貿易順差，然而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重要性卻不足以支撐這個順差，因此不得不持續積累外匯儲備。更加糟糕的是，迫於貿易夥伴要求中國減少貿易順差的壓力，中國不得不讓人民幣在2005年之後的近十年間持續升值，而升值預期又導致大量「熱錢」湧入，進一步推高了中國的外匯儲備。貨幣錯配的成本不僅導致經濟剩餘外流，讓中國受到巨大損失，而且還嚴重制約了中國制訂獨立貨幣政策的空間^⑫。

在世界範圍的經濟危機和經濟衰退期間，發展中國家更加受害於金融霸權和金融掠奪。在2008年之後，發達國家不斷推出的量化寬鬆政策，導致大量「熱錢」流向發展中國家，這些貨幣流通量通過金融槓桿被進一步放大，造成發展中國家嚴重的資產泡沫。在2015年以後，「熱錢」又從發展中國家回流到發達國家，再次透過槓桿效應，導致發展中國家的資產泡沫破裂。全球金融霸權操作下的「熱錢」流進和流出嚴重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例如2015年中國由於資本外逃流失外匯達6,000至8,000億美元，當年A股市場的股災和外匯市場的劇烈波動，都在很大程度上與「熱錢」的流動有關。幸好中國迄今基本上仍然能夠管控資本賬戶的核心項目，因此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受到的損失還不算特別嚴重^⑬。

麥金農和施納布林歸納了中國領導層應對貨幣錯配的政策取向，即在2008年以後，中國加快了放開國內金融市場的步伐，期望以此強化跨國資本持有人民幣的信心、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以作為美元的替代^⑭。然而，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既有霸權格局之下，尤其是經濟衰退期間霸權運作導致金融投機

活動加劇，中國的上述政策取向問題叢生。加快人民幣國際化和放開國內金融市場讓「熱錢」流動更加方便，導致中國資產市場劇烈波動；金融投機活動更嚴重地擠壓了生產性投資，促使中國的生產性企業也愈來愈投機化。中國的領導層由是面臨兩難選擇：如果現存的國際貨幣體系和政治經濟秩序不變，即使按照這種方式實現人民幣國際化，最好的結果也只不過是通過中國經濟的金融化從全球金融霸權中分得一杯羹，即讓中國完全融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而更加可能、也是最壞的結果是中國被全球金融霸權所俘獲和劫掠。

歸納起來，圖1下半部分的邏輯鏈描述了中國在當前資本主義系統性積累邏輯中的位置。一方面，中國順從了這個邏輯，表現為生產領域的「富士康模式」，以及在金融領域一定程度上被國際投機利益所裹挾或俘獲；另一方面，中國仍然在抵抗這個邏輯，表現為趨向「黃金時代模式」的制度結構安排。近年來，中國領導層啟動了「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一系列國際合作機制以重塑世界經濟圖景。這些國際合作機制的其中一個重要意義，就是要在讓金融資本為生產性經濟服務的方式下促進人民幣國際化，而不是加入現存的、投機導向的全球金融霸權。中國尋求替代當前資本主義系統性積累邏輯的努力能否成功，這不僅對中國發展至關重要，而且對全世界的發展前景來說同樣至為關鍵。

四 結論和展望

認識到新自由主義是世界資本主義的系統性運作邏輯，或至少在相當程度上具有這種性質，對於理解上文所述的世界範圍內制度變革及其發展後果，以及改革開放年代中國經濟變革的演化，可謂十分必要。這其中有三點尤其值得深究：

第一，IMF在2000年秋季《世界經濟展望》中承認全球化前二十年世界發展失落，尤其是蘇聯集團國家的「休克蕭條」偏離政策信條許下的承諾，這種承認過失的態度在隨後因應實際經濟狀況的起伏而時有浮現，至2016年IMF旗艦刊物《金融與發展》(*Finance and Development*)中的〈新自由主義是否推銷過度？〉(“Neoliberalism: Oversold?”)這篇總結性文章可說是達到高峰¹⁶。然而，這種承認不僅很有限度，甚至有可能是為了掩護更根本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新信條。自新世紀以來，與華盛頓建制相關聯的政策和經濟研究主題，諸如金融發展的法律制度基礎、市場與憲政作為經濟發展的前提、殖民地制度遺產的正面意義等等，重申原有的承諾和對尋求市場原教旨主義替代模式的否定，終究也是為了服務上述的資本積累的系統性運作邏輯。

第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一旦(放棄革命而)決定改革開放、對接以至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就無法不面對資本主義系統性運作邏輯的新自由主義的強制性，這就不是簡單的政策信條能否、是否選擇的問題。因此，縱使是獨立自主的中國，在直至今日的整個改革開放進程中，其政治經濟變革路徑始

終為世界範圍內強制性與尋求自主發展這兩種力量之間的競爭所主導。僅就經濟層面而言，在2008年之前主導的是「富士康模式」（勞動密集和低工資模式）與「黃金時代模式」（資本深化和高工資模式）的競爭，在2008年之後主導的是金融投機化與生產性投資和創新的競爭。

第三，上文對新自由主義的闡釋，僅是聚焦於它的現實向度，即政策信條及其推行，並沒有涉及它的思想或意識形態向度。既然新自由主義在當代世界資本主義中具有系統性的運作意義，它的意識形態內涵也就往往被包裝成普世價值來作為政治鼓動力量，極具魅惑作用。而按照上文的論述，落實下來的新自由主義卻往往與價值本身相去甚遠，所謂「普世價值政治」實際上卻是社會發展失落和人道災難的代名詞。正是這種缺陷使得政治鼓動者有機可乘，成事之前奢言道德政治，敗事之後推卸責任，說失落和災難是現實的錯，不是意識形態的錯。

上文對中國改革開放年代發展模式與經驗的概括，核心論題是認為中國經濟迄今始終是以生產性活動為主流導向，集中表現在生產性投資的持續快速增長上，而這種增長又是以特定的經濟制度和結構條件為基礎，尤其是體現在朝向「黃金時代模式」的消費和投資、工資和生產率、就業和產出的同方向按比例增長的趨勢上。與此相對，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特徵是個人化理性選擇，讓所有的資源和資產都可作為金融交易，其邏輯後果是經濟金融化，其經濟制度和結構基礎是生產性投資萎縮和收入分化。顯然，兩相比較，「黃金時代模式」遠比新自由主義更能切合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

而經濟發展模式其實還有其政治基礎問題，新自由主義的實質是以個人替代社會、以資本的自由替代公民的自由，然而「(個人化的)自由至上」畢竟也有可能被包裝成普世價值言說，甚至成為「歷史終結論」的極端宣示^①。「黃金時代模式」的實質是勞資之間的階級談判和妥協，一定程度上以限制資本的自由、維護福利社會來支撐這種妥協，表現在政治上就是社會民主主義，而「(全民名目的)民主至上」同樣也有可能被包裝成普世價值言說，甚至在冷戰時代出現了歷史存在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趨同論」^②。如果未來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真的是以趨向「黃金時代模式」為主導(而且透過「走出去」向外擴散)，那麼其政治基礎將是甚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又將怎麼演化？

註釋

① 本文的統計數據來源，除特別註明外，中國的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各期，www.stats.gov.cn/tjsj/ndsj/，國際比較數據來自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網站，<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數據庫，www.imf.org/en/Publications/SPROLLS/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s。

② Martin Hart-Landsberg and Paul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 *Monthly Review* 56, no. 3 (2004): 1-12;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hilip C. C. Huang, "Profit-making State Firms and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State Capitalism' or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Modern China* 38, no. 6 (2012): 591-629.

③ Alfredo Saad-Filho, "Neoliberalism",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Marxian Economics*, ed. David M. Brennan et al.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④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00).

⑤ William Easterly, "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1980-1998",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6, no. 2 (2001): 135-57.

⑥ Jagdish Bhagwati, *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Robert Wade, "Choking the South", *New Left Review*, no. 38 (March-April 2006): 115-27.

⑦ Anita Chan, "A 'Race to the Bottom': Globalisation and China's Labour Standards", *China Perspectives*, no. 46 (March-April 2003), <http://china.perspectives.revues.org/259>; John B. Foster and Robert W. McChesney, *The Endless Crisis: How Monopoly-Finance Capital Produces Stagnation and Upheaval from the USA to Chin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2); Martin Hart-Landsberg, "The Chinese Reform Experience: A Critical Assessment",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43, no. 1 (2011): 56-76.

⑧ 關於「掠奪性積累」的系統論述，參見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⑨ 數據來自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網站，<https://unctad.org/en/Pages/Home.aspx>。

⑩ 關於自 1990 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經濟變革向「黃金時代模式」趨同的論述，參見 Dic Lo, "China Confronts the Great Recession: 'Rebalancing' Neoliberalism, or Else?", in *Emerging Econom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Great Recession*, ed. Philip Arestis and Malcolm Sawy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232-69。

⑪ 數據來源參見 IMF「國際金融統計」(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http://data.imf.org/?sk=85b51b5a-b74f-473a-be16-49f1786949b3> 和「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 數據庫，<http://data.imf.org/?sk=E6A5F467-C14B-4AA8-9F6D-5A09EC4E62A4>。

⑫⑬ Ronald McKinnon and Gunther Schnabl, "China's Financial Conundrum and Global Imbalances", BIS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Working Papers, no. 277 (March 2009), www.bis.org/publ/work277.pdf; "China's Exchange Rate and Financial Repression: The Conflicted Emergence of the RMB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China & World Economy* 22, no. 3 (2014): 1-35.

⑭ Dic Lo, "Perspectives on China's Systematic Impact on Late Industrialization: A Critical Appraisal",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⑮ Jonathan D. Ostry, Prakash Loungani, and Davide Furceri, "Neoliberalism: Oversold?",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53, no. 2 (2016): 38-41.

⑯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⑰ Samuel Bowles, David M. Gordon, and Thomas E. Weisskopf, *Beyond the Wasteland: A Democratic Alternative to Economic Decline* (London: Verso, 1984); Andrew Glyn et a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olden Age", in *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 Reinterpreting the Postwar Experience*, ed. Stephen A. Marglin and Juliet B. Scho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39-125.